

中国二十世纪思想文库·新论语



梁启超语萃

马 勇 编

华夏出版社

870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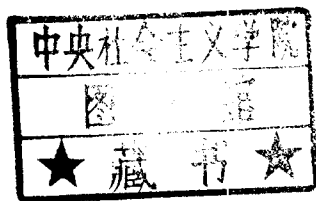
中国二十世纪思想文库·新论语



200111565

梁启超语萃

马 勇编



1993年·北京·华夏出版社

(京)新登字 045 号

中国二十世纪思想文库·新论语

梁启超语萃

马 勇 编

*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6.25印张 130千字 插页2

1993年9月北京第1版 1993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4500册

ISBN7-5080-0141-9/Z·136

定价:6.90元

中國二十
世紀思想
文庫

啓功題籤





梁 启 超
(1873——1929)

总 序

张岱年

20 世纪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的转折时代。从 1840 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受到资本主义列强的凌侵,全国人民奋起斗争,致力于救亡运动。20 世纪之初,孙中山先生发起革命运动。1912 年辛亥革命终于推翻了二千多年的君主专制。辛亥革命虽然没有彻底完成任务,但是从此以后,谁要再敢建立帝制都成为不可能的了,这就是一个伟大的成就。1915 年陈独秀发起新文化运动,从此新的思潮风起云涌,对于陈旧的传统观念进行了猛烈的冲击。继而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李大钊等宣传马克思主义,发生了空前深刻的影响。

自 19 世纪中期以来,西学东渐,西方近代思想引起人们的注意。严复译述《天演论》,起了振聋启聩的作用,同时又广泛地介绍了西方的思想学说。梁启超更以通俗的文笔阐述新学,引起了青年学子的共鸣。章太炎鼓吹革命,也推动了历史的进步。“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胡适提倡提文学革命,发生了广泛而深入的影响,从而白话文代替了文言文的正统地位。在文学革命中成就最大的是鲁迅,在文学史上具有卓越的地位。

20 年代以来,文化问题、中西文化的异同,成为热烈争论的问题。胡适倾向于“全盘西化”,对于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认识不足。

梁漱溟起而以捍卫中国文化传统为己任。梁漱溟刚直不阿,表现了中国古代哲人的风范。

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疯狂侵略,国事日急。广大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奋起抗日。一些学者努力于学术救国,从事于新时代的中国哲学的创建活动。若干学人提出了自成一家之言的融会中西的学说体系,其中最有影响的有熊十力、冯友兰、金岳霖。这些学者的学说虽未必切合时代的需要,但其理论的深邃、论证的精密、与古代哲学家或西方哲学家相比,实毫无逊色,在中国学术史上应有一定的地位。

经过抗日战争及国内解放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起来了,彻底驱逐了外国侵略势力,保卫了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伟大的新时代。但是50年代后期,由于“左”倾思想的影响,文化学术又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史无前例”的所谓“文化大革命”更给文化学术带来了惨重的灾难。1978年党中央拨乱反正,于是文化学术走上蓬勃发展的坦途。现在到了20世纪最后七年了。在这七年中反过来再看一下20世纪思想学术发展的过程是有益的。总而言之,20世纪是中国学术思想上的一个辉煌的时代,学人辈出,群星灿烂,多家竞胜,蔚为壮观。

20世纪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比较特殊和复杂的时期,在研究中国20世纪思想史以及评价20世纪思想家时,要做到全面、深刻、客观、公允,确是一件不容易但又意义深远的工作。

首先,是注意不要把中国20世纪思想史与中华民族在20世纪的全部历史隔离开来,因为思想史与文学史、社会史、艺术史乃至政治史都是中国历史的有机部分。同样在评价中国20世纪思想家时,要注意不能脱离他所处的社会时代背景,一个思想家思想的产生、演变、发展及其特点,有其个人因素,也有时代因素。

其次,中国20世纪思想史是整个中国思想史的一部分,也是最“新”的一部分,我们应有历史发展和全面的眼光。我们现在正处

于 20 世纪的最后七年,研究这个世纪的中国思想史,既不能脱离 18、19 世纪乃至更早时期的中国思想史、又应注意中国 20 世纪思想史所具有的特点、还应想到为了下一个世纪中国文化思想的更新和光大。

再次,在研究、评价 20 世纪的中国思想家时,要注意实事求是,切忌把学术思想与政治倾向、处世方式等相混淆,注意不同历史时期的学术思想之特点,把握学术思想演变中的主流,当然也要客观研究某些因素对其思想的影响。只有这样,才能客观地评估思想家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及其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价值和意义。

“中国 20 世纪思想文库编辑委员会”重点选择中国 20 世纪有重要贡献的学者为文化发展、民族振兴所作有意义的探索的思想成果,辑录成《新论语》丛书,每人一卷。编者均为国内学有根底的中青年学者。我认为这是一项有重要意义的工作,对于学术发展、文化建设将有重大的裨益。刘耿、王骏等同志希望我为这套丛书写一篇总序,于是略述个人对于中国 20 世纪学术思想的观感,聊供读者参考。

1993 年 1 月序于北京大学中关园

编 序

若问在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哪一个人物的影响最大？相信读者不难举出一系列备选名单，但其中决不会漏掉大名鼎鼎的梁任公启超先生（1873——1929）。正是梁启超那些“笔锋常带感情”的文字（胡适语），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近代中国的急剧变化，而且深深地影响了整整一代中国人。毛泽东曾一度以梁启超为人生“楷模”，读梁氏的文字“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①郭沫若也曾深情地回忆说，在那时，不论是赞成还是反对梁启超的政治主张，“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他的功绩实不在章太炎辈之下。”^②

然而应该指出的是，梁启超的影响毕竟是多方面的，毛、郭的回忆无疑更多地强调了梁启超思想影响的积极方面，而且侧重于梁启超一生中最辉煌的那些年代。事实上，正如梁启超自己所评价的那样，他是一个“流质善变”的人，往往随着时代条件的变化，“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故而如果仅仅看到梁氏思想影响的积极方面，恐怕并没有描绘出梁启超思想品格的真实面目。甚至如严复所说的那样：“吾国自甲午，戊戌以来，变故为不少矣。而海内所奉为导师，以为趋向标准者，首屈康[有为]、梁[启超]师弟。顾众人视之，则以为福首，而自仆视之，则以为祸魁。”^③严复的这种低调

① 《西行漫记》。

② 郭沫若，《少年时代》。

③ 《与熊纯如书》第30，《严复集》第631页，中华书局1986年。

乃至反调评估或失诸偏颇,但他无疑向我们提出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那就是梁启超毕生数变的真实心迹何在?这种变化究竟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占有何种地位和意义?

对中国命运与前途的焦灼关怀

梁启超的出现是近代中国特殊环境下的特有现象,换言之,如果不发生近代中国那一系列急剧性的政治变化,准确地说,如果不是出现 1894 年中国在与日本的战争中的惨败,那么,不论梁启超天生具有怎样的反叛精神,他最终都不能逃脱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一般成长道路——科举致仕。

然而,1894 年在近代中国乃至数千年中国的历史上委实重要,它不仅由此基本宣布清政府辛苦经营达三十年之久的洋务运动彻底破产,而且意味着中国数千年来独立、优越的发展趋势已一去而不复返,中国不但要被迫卷入世界一体化的发展潮流,而且极有可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不得不处于一个屈辱的弱势。尤有甚者,伴随着 1894 年的灾难,30 年前开始追随西太后的一批政治领袖、学界名人必将成为历史的陈迹,而不得不逐步让位于一代新人。我们看到,在 19 世纪末年,20 世纪开始的 20 年中最为活跃的那批政治领袖、学界领袖,几乎无一例外地都与 1894 年的巨变有或深或浅的关系。

1894 年的中国巨变,尤其是清政府当道者的昏庸无能,对年仅 22 岁的梁启超来说无疑形成了刻骨铭心的印象,他的爱国主义情绪和极其强烈的忧患意识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油然而生。他在此时所作的一首诗中写道:

奇士在世间,即造一世福。

履崇与处庳,所愿乃各足。

新义凿沌窍，大声振聋俗。
数贤一振臂，万夫论相属。
人才有风气，盛衰关全局。
去去复奚为，芳草江南绿。
采掇为及时，无为自穷蹙。^①

于是，必彻底放弃其祖父辈属望甚高的科举考试，转而追随他的老师康有为，为中国的命运与前途而奔走呼号，“已渐有慷慨激昂之态”。^②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其直接后果是巨额战争赔款和割让台湾。因而当《马关条约》的内容传来的时候，梁启超和他的老师康有为等人最直接的反应便是调动舆论，试图以中国传统社会知识分子集体上书的形式，压迫或者说是支持清政府拒签对日和约，“力言台湾万不可割。”^③然而清政府此时面对的日本毕竟不同于往昔那些屈从于中华帝国的“蛮夷之邦”，因此，尽管有康、梁这样一大批热血知识分子无保留的支持，清政府也不得不在《马关和约》上签字画押。

清政府的昏聩无能，软弱乏力，既在梁启超的意料之外，也在其预料之中。因为早在1892年他就相当清楚地意识到，中国之弱的根本原因不是来自其他方面，而根源于中国人数百年的闭塞愚昧。他说：“启超半年以来，读书山中，每与诸同志纵论世变，退息虑而熟思之。窃以为今日时事，非俟铁路大兴之后，则凡百无可言者。奚以明之？中国人士，寡闻浅见，专己守残数百年，若坐暗室之中，一无知觉。创一新学，则沮挠不遗余力，见一通人，则诋排有如仇

① 梁启超：《与穰公同年书》。见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2～3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② 梁启勋：《曼殊室戊辰笔记》。见《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6页。

③ 《任公先生大事记》。见《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7页。

雖，此其故皆坐不興鐵路。鐵路既興之後，耳目一新，故見廓清，人人有海若望洋之思，恍然知經國之道之所在，則不待大聲疾呼，自能變易，則必無詆排，必無沮撓，然後余事可以徐舉，而大局可以有為。”¹

基于此种认识，梁启超对“公车上书”的失败并不感到十分的意外，此次失败不仅没有减弱他的爱国热情和忧患意识，恰恰相反，更增强了他的历史责任感与时代使命感。于是在1895年7月，梁启超便积极协助康有为在京师创办强学会，刊行《中外纪闻》，期望以此提倡新学，开通风气，“冀输入世界之智识于我国民，且于讲学之外，谋政治之改革。”² 故而我们看到，强学会的性质确如梁启超所说的那样，实兼有学校与政党而一之焉。

强学会的宗旨无疑是为了爱国、强国，因此在它成立之后便获得了迅速的发展，不仅赢得了那些关心国事的一般士人的支持与参与，而且吸引了相当一批朝中开明官僚的理解与帮助。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强学会的领导人好自为之，审时度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那么强学会便极有可能成为未来中国政治改革的“思想库”或策源地。然而不幸的是，强学会的主要领导人毕竟没有足够的政治经验，不仅强学会内部管理混乱、人员庞杂，而且由于强学会的领导人具有先入为主的偏见，完全凭个人的好恶品评朝中人物，并主观地将朝中人物区分为主张改革的所谓“帝党”，和主张保守的所谓“后党”，对前者竭力拉拢与亲近，对后者则竭力贬低乃至拒绝入会。正是这种幼稚的政治理念，不仅引起了那些被拒绝入会者的强烈反感，而且实际上由此注定了强学会的命运和康、梁终其一生政治生涯的悲剧性结局的思想根源。换句话说，如果康、梁等

1 《与穰卿同年足下书》2。见《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第182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2 梁启超：《莅北京大学校欢迎会演说辞》，《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九，第38页，中华书局，1989年。

人当时好自为之，不过分介入统治层的内部斗争，那么，不但强学会的结局要好些，而且康、梁本人也必将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然而，真实的历史毕竟不如后来者出自良好愿望的假设那样美好。曾经参与其事的汪大燮、吴樵等人在当时就已清楚地看到：“强学书局自十月开设之后，口舌甚多”，^① 内部斗争不休，“强学会被康长素糟坏，致有浮言。”^② 尤其是当朝中大臣李鸿章因捐金入会被拒之后，强学会的负责人又向刘坤一函索五千金。这便不仅触怒了李鸿章，致使李鸿章出使俄国前发誓：“若辈与我过不去，我归看他们尚做得成官否”？^③ 于是，李的儿女亲家御史杨崇伊便“揣政府之意，迎合李、孙、欲借此以兴大狱，遽以聚党入奏。朝旨并不交查，遽封禁。”^④ 轰动一时的强学会和《中外纪闻》便转眼间成为过眼烟云，梁启超的救国理想不能不由此而受到强烈的刺激，其忧患意识也不能不由此而加强。

致力于中国文化复兴事业

袁世凯的帝制自为激起了举国反对和众叛亲离，很快便失败身亡。经此事变的强烈刺激，梁启超虽然一时荣戴再造共和的功臣的美名，但他实在高兴不起来。恰恰相反，使他时时感到不安的依然是如何提高国民的整体素质，以便为中国的未来发展奠定良好的思想文化基础，因此我们看到，梁启超在护国战争结束之后直到他生命结束的那些年里，他虽然并没有完全忘却现实政治，不时就重大政治问题发表意见，但他的主要精力确已转移，确如他自己所

① 汪大燮：《致汪康年书》第62，《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第720页。

② 汪大燮：《致汪康年书》第63，《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第723页。

③ 汪大燮：《致汪康年书》《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731页。

④ 吴樵：《致汪康年书》。见《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第472页。

1625/08 目 录

总 序.....	张岱年(1)
编 序.....	(1)
一、中西社会与文化的比较	(1)
中学与西学之关系.....	(1)
中西民主之异同.....	(2)
倡设女学议.....	(3)
言文分而人智局.....	(4)
学说隘而思想窒.....	(5)
学术与社会风气.....	(6)
海外新思想与中国社会风气.....	(7)
教非人力所能保.....	(8)
孔教与群教之异同.....	(9)
保教之说束缚国民思想	(10)
最大多数最大幸福义	(12)
难文化复古	(13)
采群教以光大孔教	(14)
宗教的意义	(15)
强欲复古,决无成绩,而徒种恶果	(16)
西方文明的破产	(17)
孔教不会亡	(18)
达尔文主义的失败	(19)
科学万能之梦的破灭	(20)

思想解放的关目在于择	(21)
东西文明的互补与创新	(23)
中国文明的现代意义与责任	(25)
中西政治之异同	(26)
中西社会之异同	(27)
中西经济之异同	(28)
民族精神的自觉	(28)
民主精神之自觉	(29)
情感、理性与宗教	(31)
信仰神圣	(33)
不应把科学看得太低、太粗	(35)
不要把科学看得太呆、太窄	(36)
科学精神的第一层含义在求真知识	(36)
科学精神的第二层含义在求有系统的真知识	(37)
科学精神的第三层含义在于教人以知识	(39)
中国思想界的病症	(40)
人的自觉与人权运动	(41)
女权运动的真意义	(42)
救济精神饥荒的方法	(44)
儒佛两家的相同点	(45)
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如何调和	(47)
对中国文化未来责任的期望	(48)
个性与社会性如何调和	(48)
主张学校读经之理由	(49)
二、政治理想与政治态度	(52)
凡在天地之间者,莫不变	(52)
论不变法之害	(53)
变法之本,在育人才	(54)

学会的作用	(55)
变法需知本原	(56)
防弊之心起于自私	(57)
中国积弱由于防弊	(58)
欲振中国，在兴学会	(59)
报馆有益于国事	(61)
强国以议院为本	(61)
破坏主义	(63)
君主与民主	(64)
国权与民权	(64)
戊戌维新之目的	(65)
少年中国说	(67)
说国民力	(68)
中国少年之责任	(68)
自由之真义	(69)
中国积弱之源于政术者	(70)
宪法与民权	(71)
自由与制裁	(72)
过渡时代之英雄所必具的德性	(73)
破坏与成立	(75)
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	(76)
干涉与放任	(77)
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	(79)
中国之社会主义	(81)
保守与进取	(81)
国家思想真解	(83)
自由与团体	(84)
专制久而民性漓	(86)

大一统而竞争绝	(87)
论破坏主义	(88)
专制政体与私德之陶铸	(89)
内乱之影响	(90)
革命真解	(92)
新民说与新民议	(93)
专制政体之罪孽	(94)
改革与革命	(96)
专制政体十大罪	(96)
国民之责任	(98)
温和主义与破坏主义	(99)
竞争与秩序	(101)
释开明专制	(102)
专制与非专制	(103)
革命决非能得共和而反以得专制	(104)
社会进步与拾级而升	(105)
难民生主义	(106)
今日中国不可行共和立宪制之理由	(107)
难社会革命	(109)
难政治革命	(110)
难种族革命	(111)
人民程度与君主立宪	(111)
开明专制与服从舆论	(112)
政党政治惟系少数主持政党之人	(113)
任何事情均不应驰于极端	(115)
身任国事者应纯以国家利害为本位	(116)
全民政治是救国的不二法门	(117)
社会主义何以在中国尚不能实行	(118)